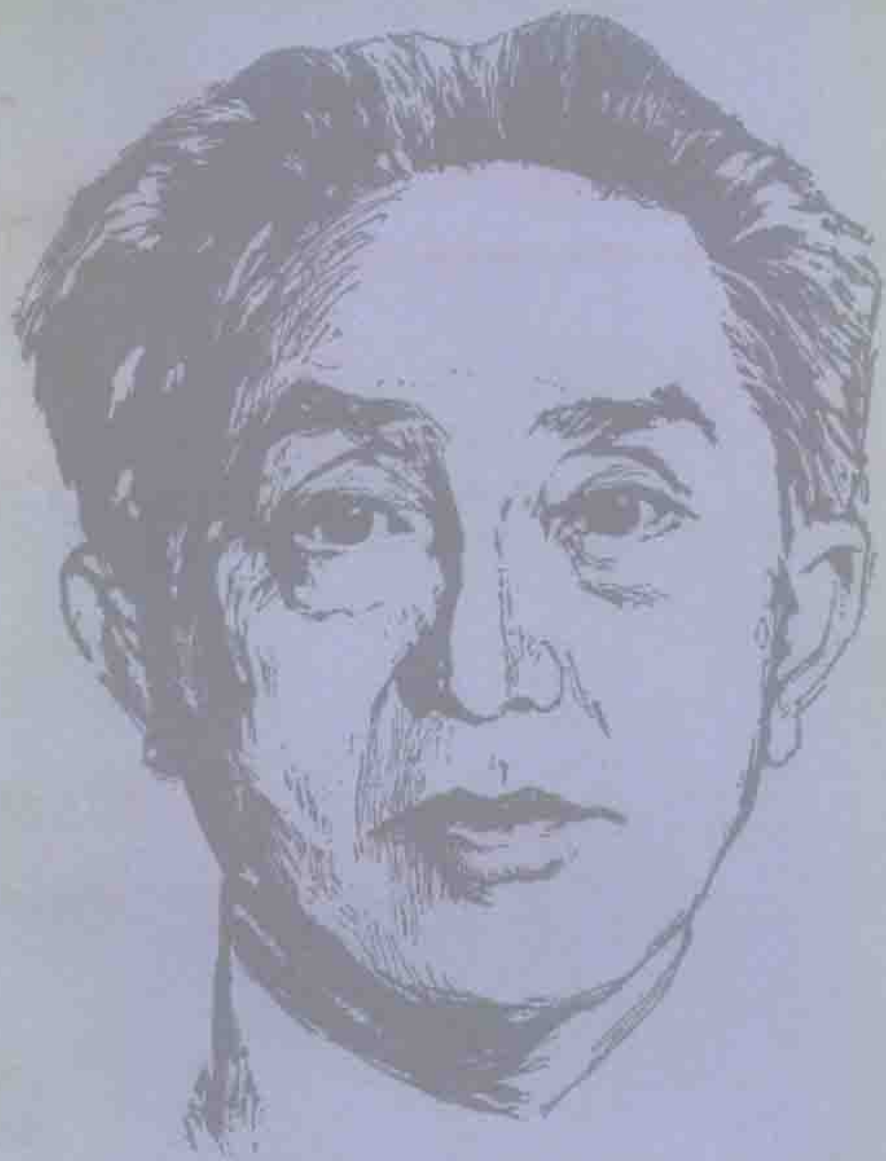




巴人文艺论集

巴人文艺论集

谷斯范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巴人文艺论集

Baren Wenyi lunj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34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frac{1}{2}$ 插页 3

198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8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书号 10019 · 3733

定价 1.8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从王任叔（巴人）同志 1935—1959 年所写的文艺论著中选收 36 篇，其中一部分选自早已绝版的论文集；另一部分则是散见报刊从未结集的零篇，包括一篇尚未完成的遗稿。文章按发表或出版年代编次，并按建国前后，分编为两辑。

所收文章除改正个别笔误，芟除个别引文外，一律未加更动，以保留它们的历史面貌。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84 年 3 月



作者像 (1964年)

但問題是
在這裏：

社會學是研究社會的科學，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此，社會學的研究，是研究社會的現象，因

作者手迹

目 录

第 一 辑

文艺短论	3
高尔基底创作的手法	39
叛逆的灵魂	45
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	64
救亡时期的文学问题	94
文艺杂谈	102
短论三题	106
评《谷》及其他	113
剪裁	124
丑恶的描写	127
扪虱谈	130
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	147
地主性格	152
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	161
略评《新生代》第一部	175
民族形式与大众文学	182
论鲁迅的杂文	198

第 二 辑

关于《牛虻》	265
我所看到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280
读《列宁》	295
关于《士敏土》	313
高尔基的《母亲》	327
读《初雪》	336
《青年近卫军》的艺术构成及其人物形象	342
读《农村散记》	363
典型问题随感	374
关于创作	383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	394
也谈徐志摩的诗	413
谈小说《青春之歌》	420
漫谈《百炼成钢》	429
略谈赵树理同志的创作	434
果戈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	442
闲话《夜归》	453
创作琐谈	461
论《西游记》（未完稿）	468

第一辑

文艺短论*

人·作品与批评

作品是人造的。所以每一篇作品，除去公文体式似的八股文外，没有不渗透作者的人格。作者的人格在作品里渗透得越深切，那作品便也越使人感动。同时，那作者的人格的社会性越大，那么，被其人格所渗透的作品的价值也越高。所以，我以为如其一个顶好的批评家，必能从作品中把握作者的人格。评书，即所以评其人。实无搜罗作者无关紧要的私生活，加以中伤、攻击的必要。

固然，人格不免有分裂的时候。所以在世间常常可以看到有两重人格的人。

形成一个人的人格的要素，大概也就是所谓“言”和“行”吧。但比较确实的说，是“思想”和“行为”。有了某一种思想，于是以某一种行为表现出其思想；那就是那个人言行合一之处，也就是那个人人格统一之处。反之，有了某一种思想，却因为社会的阻碍，使那人不能，而且不敢给表现在行为上；甚或自暴自弃地与世浮沉，以求苟全。那便是言行不能合一，人格分裂的人。也就

* 文艺论文集《常识以下》原收十五篇文章，一九三六年四月由上海多样社出版。一九三九年六月由上海珠林书店再版，改名为《文艺短论》。这里选收其中的十篇。——编者注

是所谓两重人格的人。

在他方面，社会亦有其最高标准的特定的道德与思想，在某一特定的社会里，常常会责求生活在这社会里的人们，秉有其特定的道德与思想。但另抱有别一种的道德与思想的人，每每跟这特定社会不相融合；但是那特定的道德与思想的压力太大了，使他又不得不在形式上表示屈服。这种人从特定社会的视角来看，无疑是人格分裂了的两重人格的人。同时，自己根本没有理想的；生在这个特定社会里，就以其特定的道德思想为自己的道德思想。如其这个特定社会改变过来了，他便也跟着改变。这种人，从这特定社会的视角来看，无疑是人格完整的。在历史上给判定为奸雄的曹操，其所作短歌行诸乐府，我们至今读之，尚能把握其分裂了的人格的可爱的一面。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这总属颇近人情的话。同样，从特定的封建社会的视角看来，十足地表现了他那忠心主人的完整人格的陈孔璋，其《檄豫州》文，也就因为它发挥了封建道德与思想的最高的标准，所以直到今日，还流传下来，万人传诵。但“父嵩乞丐携养，窃盗鼎司，操赞阉遗丑，本无懿德……”云云，在我们看来，实未足为曹操罪。所以，人格分裂了的人，不一定没有好作品；人格完整的人，不一定会有好作品。但其中也有个限度，即人格分裂了的人，是指那时时能在自我检阅中而意识到其分裂的痛苦的人。往古不少文学家，怕有不少人在这一种痛苦中产生其伟大作品的。

而且，更进一步说，一篇好作品，既已用铅字排了出来，出现在大众面前；那作品本身，已经作为一个社会的存在而存在着了。这不特是那些渗透了作者的人格的作品如此，即如公文程

式似的八股文，也可看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我们读者，皆能透过这作品，找出其产生的社会的根据。这种艺术的社会根据，虽然在复杂多态的社会里，也可很正确而客观地把握到。中国现在小品文的发展的社会根据，即存在于社会的政治的不安日益深化，与其寄思于小说而从事著作，不若取直接表达思索的方式，更为痛快，这一个原因上。批评者，如果能在其作品中，指出社会的根据时，早已更深入地给予作者一个致命的打击了。实无再进一步攻讦作者私生活的必要。

能少引起些无谓的争端，在作品本身中指摘出倾向借此以改进文坛的批评家，我以为，是中国现阶段需要的批评家。而且我希望着这样的批评家的出现！

论文学作品中之定命论思想

阅报，见艾登完成东游使命，返抵伦敦，其答记者询以最近是否尚拟赴法时的话说：“此层为余所不知，余当先向内阁同僚报告此行结果，总之一切均当凭天命而已。”读了后，觉得艾登这话，全不象政治家风度，而颇带些文艺家口气。固然，在艾登这口气中，足见欧洲风云，正未可预料；和平希望，仅不断如丝而已。但这口气似乎不是一个造时势的政治家所应有的。

但自己回过来一想，就是这种口气，——听天由命的口气，也不一定是文艺家所应专有的。事实上，叱咤风云的项羽，一到垓下被围之时，也不免叹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所以不仅仅是文艺家，就是造时势的英雄，也不免要陷在定命论里，叹了口气，放下肩仔来的。这是自古已然的事。不过文艺家是人类中最多感而且也最怯弱的人，更容易陷入定命论里罢了。

但历来的批评家，对于文艺家抱定命论思想，却未有不大赞美特赞美的。太史公批评屈原的《离骚》说：

《离骚》者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这里所谓呼天，呼父母，怨诽而不乱，就是说明屈平深得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便是听天由命。太史公不说屈平有点过于偏执，而偏说他怨而不乱，深合中庸之道，足见太史公对于屈诗人，是很夸奖他能在一定范围内安命立言的。几千年来，文艺批评家，没有不以此种温厚敦藉的诗人风度，来奖励一切文艺作者的。

但这种趋向，自然也有其社会原因。因为中国社会，直到现在还没有摆脱了封建形态。在农业的，封建的社会里，艺术是每每跟宗教合致，用一种宗教的仪式出现，而扶助这封建社会之巩固的，故《毛诗正义序》里说：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黻，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性情，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诗之为用其利大矣哉。

所以诗教是中国历来政治的一大端。而一切诗人，文艺家，也只能在“美”“刺”二种意义下做工夫。其甚者，却又仅知美颂，忘却讽刺。于是诗人与文艺家所走的路，越弄越狭，自然只好安

于命运。于是文艺作品中，定命论的色彩，也益发浓厚起来。

但中国文学史里，除却这一类定命论的庙堂文学之外，还有消极的定命论的山野文学。那就是从陶渊明开始的一派隐士文学。

这一派隐士文学，定命论思想，更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其出发点上说，也许是因为不满于当时政治和一切不平等现象，以文字作为遁逃藪。如明末的山人文学，就有这个趋势。因为他们处在一切不自由的环境里，自己生为文人，手无缚鸡之力。既不能执干戈，对于社会国家有所改造；又不敢身尝斧钺，将赤血与白骨填上历史的空白。只好发为诗歌，寄情于花草虫鸟，以及一切自然美景。初则强颜为笑，勉作达观之语；继则追迹庄老佛氏，竟入化我之境；以清静无为的思想，洗练自己文字，自命清高。

但此种文学，自有其社会根据，即欲铲除，亦非一时所能奏效。我早已说过，中国社会直到现在，尚未脱却农业的封建社会这个形态。在这个社会里，一切生产工具，大都只能作为“利用自然”之用，而尚难用以“克服自然”。生产工具尚未进入“克服自然”这一阶段，则反映到人类精神生活里，定命论思想就无法摆脱。老庄的一任自然的哲学，即立足在这个社会结构的弱点上。故一批最初不满现实的人，一到处处碰壁，路路不通的时候，自己出生的社会，就叫他们回到老庄的门下，在老庄的手掌上大翻其筋斗，而自己尤不之知；以为“咱们是天高皇帝远，不过自己白嚼蛆罢了。”实际上，老庄之“无为”，正也为的“而治”。“无为而治”与“有为而治”，其为治则一也。这两派文学家——依照周作人先生说法，前者即是载道派，后者即是言志派——实则是殊途而同归。天下未有以半斤为多于八两者，亦未有以八

两足骄傲于半斤者。中国历来文艺作家总全笼入在定命论这一思想下，现在尽可不必各捧偶像，相互“打棚”也。

但文艺作家其有可以摆脱定命论的思想者乎。我说：“有，”我又说“可以”。正和中国社会一步步向前嬗变一样，在历史演进的铁则下，中国社会决不能老停留在封建形态里，中国文艺作家因之也就有摆脱定命论思想的“可能”。在此“可能性”下，中国文艺作家又可预知历史的动向；并以此动向为准绳，把眼前的现实，给以准确的测量，全盘地描绘出来。使读者透过这幅图画，知道什么是应该消灭，什么将会芽生。决定自己前趋步调。那时候，中国的文艺作家，决不是个定命论者，而是个时代的先知了。文艺家而作为时代的先知的，在欧洲是不乏先例。但在中国似乎还没有。这就因中国社会没有象欧洲社会这么地起过绝大的变化。法国资本主义社会开花的前夜，有福禄特尔、卢骚辈的说教，这决不是偶然的事。这是“时势造英雄”，在任何变动的时代中，必然会有杰出的人才出现，充作时代的号手。——这是历史的必然。然而为历史说教的，却决不是定命论者，因为他已预知历史的动向，能克服一切阻碍历史演进的坏风气与坏思想。先知与定命论者的分别，一个是开车的司机，一个是铁道上的枕木。定命论者的作用，最大的估量，不过给历史作为一条枕木而已。

所以总结一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学作品，既非载道，又非言志，是取反定命论思想的态度，抱有科学宇宙观的作品。

作家与世界观

近来文坛上对于作家有两种呼声，一种是：“忠实于主观！”

一种是：“忠实于现实（客观）！”这两种呼声恰恰相反，且都强调着独自一面的意见，发为议论。前者，苏汶先生在《星火》上发表的《作家的主观与社会的客观》一文可作代表。后者，孟式钧在《杂文》里所发表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一文可作代表。现在为使读者明白这两方面对立的意见，先把他们文章的主意原则地给写了下来；然后再来谈谈我们的意见。

苏汶先生的文章大意如下：

（一）文艺作品，是作家借用了社会的客观事实，来表现自己底主观的。故：

（二）作家的灵魂，才是使作品成为艺术品的要素。有些批评家理论家，预先肯定某一种本质的认识是对的，然后向文艺作品要求合他所预定的，这是不准作家有自己的人生观或宇宙观，也就是鼓励艺术家丧失自己底灵魂。但艺术家的灵魂，无论如何，应该是独立的自由的。

（三）不过艺术家的灵魂——作家的主观本身，也就是社会的客观的产物，是他接触到的客观人生的总和所不知不觉地形成的。而他选择的题材，也很自然的，是那些形成他的宇宙观人生观等等的人生的总和。故作家的主观本身，即为跟客观结合着的真实的存在，在真实的主观里，才有真实的客观。

（四）但社会的客观，不是单纯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复杂错综的。故作家的主观，也同样是复杂、错综、不同一的。“每一个文艺作家的主观，就各自供给了一个不同的观察角度，而这种根据不同角度的观察，那才是整个社会最近于真实的可能的表现。”

孟式钧先生的意见如下：

（一）从作品的生成的过程来看，任何作品，一定要将所表现的事象通过作者底世界观的曲折——解释，通过作者底表现技